

中国

的

心态

《中国人》丛书

杨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人

心态

的

中国人心态

中国人心态



中国
人的

心态

《中国人》丛书

杨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明权

装帧设计：何 旸

《中国人》丛书

中国人的心态

杨 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5 印张 4.625 字数 119,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25-2431-0

G·124 定价：8.70 元

总 序

余 秋 雨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这个词早就出现在西周，内涵几经变化。秦汉以后，历朝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当然最后大家终于尽力兼容互包到这个概念里边了。但是，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

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总之必须出自人与人的群体性、近距离对照，而不是两种文明在商品、器物、艺术上的交流和个别旅行家的传奇见闻。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在中国方面，把“中国人”当作一个独立的题目进行剖析而产生影响的，有辜鸿铭、林语堂、柏杨、项退结等人，而其他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个题目。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

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着这样的漫画，与读柏杨先生痛快淋漓地对中国人进行自我解剖时的心境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样的漫画本身就是异族对中国人的放肆践踏，而柏杨先生则是以自己人的身份重话警策，以免继续遭受旁人践踏。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深。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

入有关自己的思考吧。

相信会有宏著巨论出来，但论著再好，也代替不了群体投入。因此，应该有很多普及性的读物出来，加以推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人》丛书便是这样的读物。

为了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丛书摆脱了枯燥的学理形式，以随笔式的自由，一题一篇地娓娓而谈。渐渐谈成一个大问题便汇拢成书，拆开来读又各自成篇。虽然谈得轻松，但涉及的内容却未必是一切专家学者都容易驾驭的，因此这套普及丛书其实也可算是学术小丛书。从最低限度论之，它开辟了话题，开辟了素材，足以滋养和启发更深入的研究计划。

思考可以有多种态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思考最好是平心静气。为此，丛书的风格追求温厚随和，避免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偏激极端。由于不必纳入整饬严密的结构，立论的弹性很大，有时甚至以不修边幅的形态出现。试想，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多种难题，怎么能轻易地找到一条严谨的道路以通达简明的结论呢？不如以一种开放结构，闲散谈去，使一切读者也感受到加入交谈的极大可能。估计丛书中的每一本书都不会有简单结论，参与了梳理，参与了反省，参与了共同解剖，然后增长一分作为中国人的自觉性，这比什么结论都更有意思。

是为序。

1997年4月25日晨

目 录

政通人和之梦.....	1
中国人的乌托邦.....	1
“大团圆”情结.....	5
难得“中庸”.....	7
千年游侠梦.....	9
两种英雄崇拜之异同	12
《包青天》依旧卖座	15
“师道”的今昔	18
人格与功过	21
“史官”人格	21
漫谈“孝”	24
人性的困惑	27
西门庆走红	30
“第三条道路”存疑	32
杂说“四大美人”	35
智巧与道德	38
“智谋”的杞忧	38
“散沙”和宗派	41
“神仙”踪迹何处寻	44

话说“枪手”	47
怨与妒	49
呼唤宽容	49
东西方嫉妒比较论	52
也说南人和北人	55
中国的看客	58
难治“健忘症”	61
生死的怪圈	64
名位与风雅	67
闲话“官本位”	67
座次问题	70
为“附庸风雅”一辩	73
留名与卖名	76
“著作等身”与一本书主义	79
“知遇”的悲剧	81
关于隐士	84
义耶利耶	87
义利之辨	87
“财神”回归	91
富人的“形象”问题	94
“金融补课”的疑惑	97
何方觅此一本书	100
国粹种种	103
“国粹”与“国渣”	103

修谱热与宗法制度	106
八股遗风	110
“麻先生”胜过孔夫子	113
新旧“五经”和食文化	117
“宫廷秘方”之秘	120
远去的乡情	123
自尊与自卑	126
永远的阿 Q	126
从“郑和下西洋”说开去	130
门外说画	134
“野尻”风波	137

中国人的乌托邦

朦胧派诗人顾城在大洋洲的一个小岛上演出了一幕血腥的悲剧。他用最无诗意的方式杀死妻子然后自杀。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有人认为，顾城选择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远离城市和人群，本意在建造一个心中的“伊甸园”，不料会导致这么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

顾城的悲剧其实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这个悲剧表明：诗意的乌托邦只能保存在精神世界里，而不可进入现实，一旦进入现实终将破灭。这样的结论未免令人气短，顾城同他个人王国的毁灭是否就意味着整个“理想主义”的旁落还很难说。当今社会个人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还不能算已经绝迹，顾城也不见得就是“最后一个匈奴人”。马路上设摊的鞋匠梦想拥有一个庞大的制鞋工厂，歌舞场上的阔佬梦想拥有大观园里的“十二金钗”。这样的乌托邦，无论是生是灭，都无关紧要。有位评论家把顾城的个

人主义的悲剧同“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革”相提并论，这实在有点不伦。英国人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生产，人人从事劳动的故事。若要谈论中国人的理想主义，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自《诗经》呼吁“乐土乐土，爱得我所”（《硕鼠》）后，理想国的憧憬不绝于史，最典型的当然是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现在看来，诗人笔下的桃花源还是比较低调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相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看上去真像一个古朴的童话世界。在这里，“靡王税”是关键。躲开了“王税”，一切就可以回复到往古，连时节流逝也无须记录，更用不着徒生纷扰的智慧。汉晋以来社会动乱、人民逃亡的悲惨现实给诗人的刺激太深刻了。老庄哲学倒退的历史观又在诗人的脑膜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所以桃花源的理想主义的建构，只能是后退的而非前瞻性的。不过，我猜想陶渊明一定偶然地闯入过这么一个地方，否则他的想象就无法达到这样具体和逼真。灵感的触发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与陶渊明的乌托邦不同，正宗儒家的乌托邦总是包含较多的人世思想与进取精神。相传出于七十子后学之手的《礼运》篇中，便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大同社会”的美妙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这个“大同”社会与桃花源有很大不同，虽然表面上也是假托往古，但整个图景背后起作用的东西不是“无为”而是“秩序”。这里的人们根本不能像桃花源那样懒散而随意。

孟子也是擅长“形象思维”的思想家，他的理想比《礼运》描摹得更具体：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孟子·梁惠王上》

真是越说越来劲儿了。按说庶民百姓五十岁衣帛，七十岁才能吃上猪肉狗肉，理想并不太高，要求也不算过分。可是依旧有人要指责孟子是“迂阔而不切事情”。这也难怪，在旧时代，这种乌托邦同现实之间的差距委实太大了。差距太大便衬托出“明君贤臣”们治国的无能，激发大众的逆反心理。孟子是位质直的思想家，又动不动同别人辩论。他不懂得话要说得含混些，像《礼运》那样，模模糊糊，可望而不可即，正是恰到好处。所以后来孟子在孔庙里“从祀”的位置曾被人赶了出来，决非偶然。总之，“衣帛食肉”对于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未免奢侈，还是规规矩矩做天子脚下的顺民，少去胡思乱想。

乌托邦是要想象力的，想象力得不到滋养，只有日见萎缩和退化。董仲舒的理想是“更化”，主张“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制度》）。仲长统则赞成“井田制”，“今欲张太平之纲纪，立至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侈，非井田莫由”（《后汉书·仲长统传》）。出自儒生之手的这些乌托邦简直是“一蟹不如一蟹”，显得过于拘谨，想象力越来越贫弱。相形之下，还是《水浒》里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三教九流，不分贵贱，各有所长，随才器使”的宣言，更富有新鲜跳动的活力。洪秀全的纲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有互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原道醒世训》），也恰好与梁山好汉们同调。这份被涂抹成不同色彩的“大同世界”的长卷，就这样从远古一直延伸到了康有为“秘不示人”的《大同书》……

“乌托邦”是个很见巧思的译名。乌托邦者，子虚乌有之乡也，也许注定了是个难以寻觅的海市蜃楼。但它的价值也恰恰在这里。中国人正是在这点理想的星光的照耀下，才这么前仆后继地穿越了千年历史风尘。然而经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十年文革”等等的一代中国人，普遍地多了一份沉稳心态和务实精神。大家经商的经商，炒股的炒股，出国的出国。当年的“理想主义”热情早已褪色成一个遥远的梦境。“理想主义”也成了一个“浅薄可笑”的名词。然而人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斤斤拘守于世俗的“现实主义”也未尝不是一种浅薄。如果顾城之流真的成了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的代表，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的悲剧。

“大团圆”情结

《阿Q正传》的最后一章写到阿Q被枪毙，而标题却是“大团圆”。挨枪子儿怎能叫“大团圆”？的确，这是鲁迅先生的独创，而对于一般迷恋“大团圆”结局的人来说，实在杀风景。现实生活毕竟不是舞台，在舞台上“大团圆”，在生活中或许就是“挨枪子儿”。

本以为挨了枪子儿的阿Q这辈子是再没有“大团圆”的希望了，不料前不久书市上又出现了一部叫做《阿Q后传》的小说。小说模仿《金瓶梅》改写《水浒》的方式，西门庆没有死，阿Q也复活了。不但复活，而且同吴妈成了夫妻，继而又与赵太爷叙旧认了本家，并成了什么“蓝军”统领，住进了城里的大衙门。总之，一切功德圆满，皆大欢喜。中国人“大团圆”观念的执着和坚韧，令人慨叹，称之为“情结”，实不为过。

“大团圆”的模式也有多种。“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生旦团圆，各遂心愿，这是第一种，也最为圆满。诸如《西厢记》、《拜月亭》、《玉堂春》等均可划入此类。次一等的是《孔雀东南飞》、《梁山伯祝英台》等，生不能同衾共床，死了也要结为连理或化作鸳鸯蝴蝶。更次一等的便是《窦娥冤》、《活捉王魁》模式，生时受了冤屈，死后化作鬼魂，使恶人受惩，冤情昭雪。

无论哪种模式，都迎合了大众渴望圆满和美好的心态，故而颇受欢迎。记得前几年放过一部《渴望》的电视连续剧，一到晚上黄金时段，家家户户围坐电视机旁等待开映。一部艺术上平平的电

视剧何以有偌大魅力？其奥秘就在于“好人终有好报”，大家看了觉得畅快。剧中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至今传唱不衰，足以发人深思。

当然，也不能说凡属“大团圆”结尾，或大众对于“大团圆”的期待，都不值得肯定。仍拿窦娥来说，如果结局就那样一声不吭地死去，大幕徐徐落下，岂不是“太没劲”、“太扫兴”了？世间是如此黑暗，“为善的受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难道就此罢了不成？中国人的秉性，从来是希望事情圆满的。所谓“尽善尽美”，是一条共同的美学原则。即便是十分不圆满的结局，也得“点缀些喜色，装点些欢容”，作些修葺补缺的工作，使它不要那么糟糕。毋庸置疑，这样做对于唤起人们的正义感，激发人们与黑暗不公作斗争，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的悲剧如“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人死了，头掉了，却依旧要以特殊的形式起来抗争，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不管怎么说，“大团圆”心理总还是弊多而利少。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也是不敢正视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涂饰。譬如元稹的《会真记》，本是个典型的“始乱终弃”的悲剧，描绘封建时代一个弱女子的悲剧命运，达到了一定深度。然而一到王实甫手里，人物和情节就大变样，张生成了忠于爱情的志诚书生，中了状元也还要“梦魂离不了蒲东路”，莺莺小姐那一番“只怕你停妻再娶妻”的忧虑，也完全没有落到实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愿望固然是好的，可是这种浮在云端里的故事，能有多少真实性？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王实甫照着《会真记》的原样写，恐怕连门票也卖不出去，更不用说风靡一时，成为名著了，中国人不爱那样的悲剧。

明知所有这一切都是“假”，而偏要闭着眼睛把它当成“真”。看得久了，“假作真时假亦真”，必然会神魂颠倒，喜假厌真。这也就是在中国独多“大团圆”结局的原因所在，如果说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表现，那也只能是廉价的“乐观主义”，算不得数的。